

丁蕾 / 著

从私藏 到公共展览

民国时期广州的
博物馆和展览会

FROM PRIVATE COLLECTION
TO PUBLIC EXHIBITION:
Museum and Exhibitions in
Guangzhou (1910s-1940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丁蕾 / 著

从私藏 到公共展览

民国时期广州的
博物馆和展览会

FROM PRIVATE COLLECTION
TO PUBLIC EXHIBITION:
Museum and Exhibitions in
Guangzhou (1910s-1940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私藏到公共展览：民国时期广州的博物馆和展览会 / 丁蕾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
ISBN 978-7-5097-9939-0

I. ①从… II. ①丁… III. ①博物馆事业-概况-广州-民国 ②展览会-概况-广州-民国 IV.
①G269.276.51 ②G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8758 号

从私藏到公共展览：民国时期广州的博物馆和展览会

著 者 / 丁 蕾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李丽丽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6.5 插 页：0.25 字 数：429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9939-0

定 价 / 10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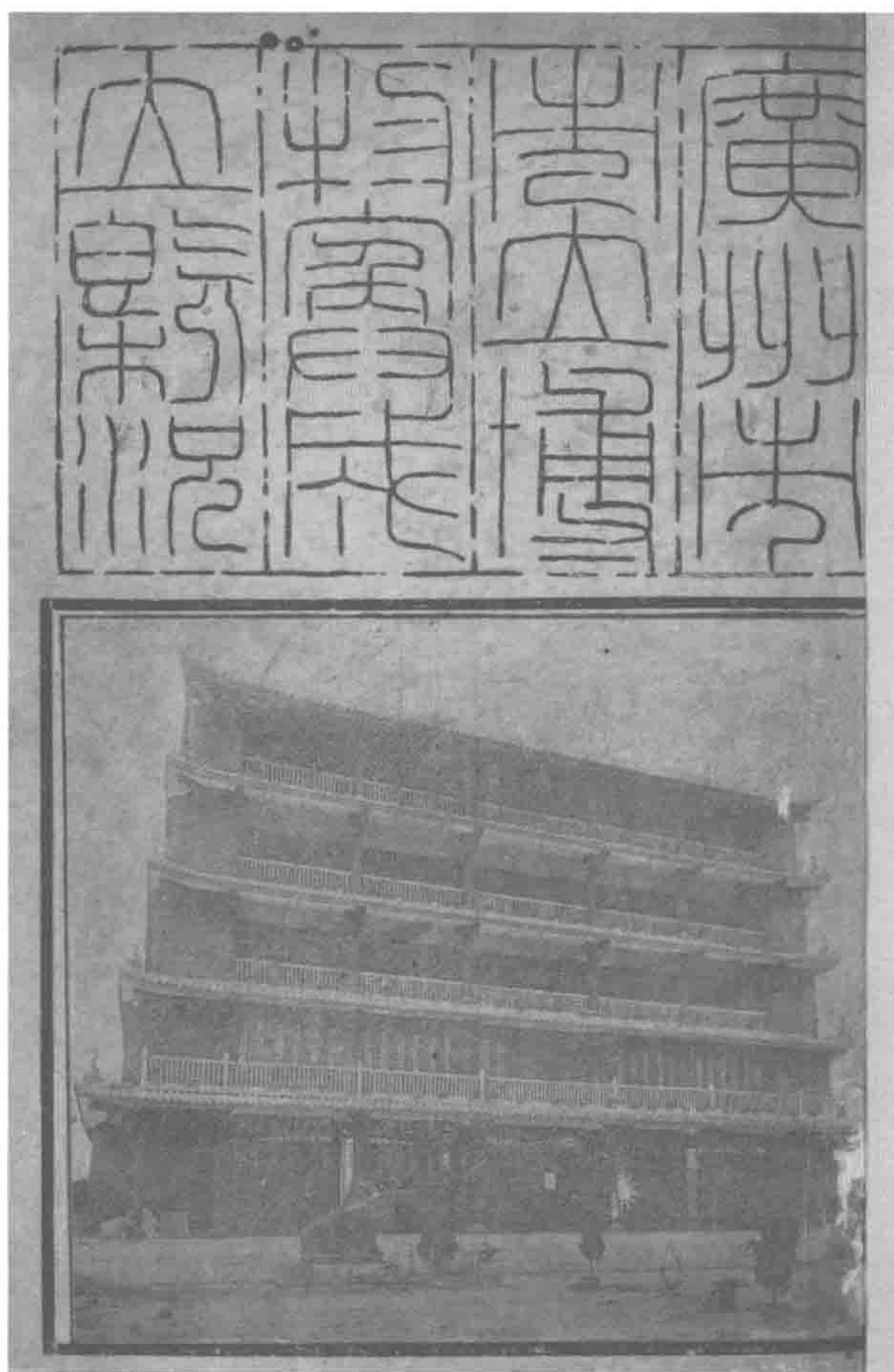


外国画家 Philip Bedingfeld 绘五层楼（约 1897 年） 广东省博物馆藏

（注：“五层楼”为广州市市立博物院原址镇海楼之俗称）

《广州市市立博物院成立概况》书影（1929 年）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本书为广东省高层次人才项目“全球史视野下的岭南社会与文化”（项目号：11200-52010005）资助成果。

目 录

导 言	001
第一章 民国时期博物馆与展览会展品溯源	017
第一节 学术潮流与物的收藏	017
第二节 革命意识与物的展示	040
第二章 民国初期物品的收藏与展示	067
第一节 金石：传统学术收藏的遗绪	067
第二节 美术：近现代物品展示的纷争	079
第三节 民俗：民间用品采集的兴起	096
第四节 考古：西方田野发掘的运用	111
第三章 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的建立与运作	124
第一节 筹备阶段市立博物院的定位	124
第二节 开放初期市立博物院的展览	142
第三节 抗战之前市立博物院的发展	167
第四章 展览会呈现的广东与广州	184
第一节 清末民初广东人参加展览会的经验	184
第二节 革命的建设：1933 年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	206
第三节 革命的历史：1940 年广东文物展	234

第五章	“海雪畸人死抱琴”：广东文物展中绿绮台琴的 个案研究.....	254
第一节	清初邝露“抱琴”形象的出现	256
第二节	乾隆以来邝露形象的转变.....	262
第三节	清末至民国时期邝露民族气节形象的重塑.....	266
第四节	琴与画：“抱琴殉国”形象的实物呈现	270
结 语		281
附 录		291
参考文献		393
人名索引		411

导 言

现今不少有关历史文化的阐述和观念，其形成和传播与公共展览有密切关系。走进广东省博物馆和广州市博物馆的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概述当地文化特性的序言，其宣称“近代中国革命策源地”等话语皆可追溯到民国时期的公共展览。文化认同是主观建构的结果，相应地，中国各地域与族群的文化认同也是一个变动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文化如何认同以及文化观念如何从社会精英阶层走向大众亦值得探讨和关注。以博物馆和展览会等形式呈现的公共展览，则是近代以来学术话语和政治理念通过具体实物展示的重要场域。

近代意义的公共展览肇始于西方，民国建立后才真正在中国蓬勃发展。本书无意梳理博物馆和展览的梗概，或具体考据某件知名文物的渊源，抑或泛泛辑录那些伟大人物的生平，仅拟聚焦于社会精英的群体活动，关注不同种类的物品由私藏走进公众视野的过程；同时，透过分析各种展品及其展示方式，尝试解读其中的内涵，以从侧面探讨清末民初思想文化转变和知识结构转型的进程。

一 相关史实

1. 中国的私人收藏

要探究民国时期物品由私藏到公共展览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意义，首先应了解此前中国人的私藏习惯，如先秦王贵为沟通神灵掩埋玉器、秦汉国家机构为巩固统治存储典籍、魏晋士族为追求艺术创作书画、隋唐士子为获得认同收集奇珍异石、宋元文人为学术研究鉴藏金石器物、明清士商为观赏把玩购置古董瓷器等。中国收藏者的身份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收藏品渐渐世俗化。收藏者当认为自己的藏品极其珍贵时，就会采取

“秘不示人”的保护措施，如清代收藏家陈介祺（1813～1884）得青铜器毛公鼎后即筑楼藏之，并嘱子孙要永远珍藏。^①“秘不示人”并非指完全不为外人所见，收藏者会依据私交程度有限地开放。若家庭条件许可，甚至于家中辟一空间专门陈设藏品。此情景我们除了可于明清画师绘制的画作中领略之外，亦可由19世纪在华西人的笔下窥得一斑。美国人亨特介绍，“古代的青铜瓶和青铜鼎”常常在富有的中国人的“书斋里占据着显眼的位置”。^②法国人伊凡在广州行商潘浩官家做客时，被引领到一房间，里面摆放着各种古玩珍宝，如瓷器、青铜、玉石、卵石和书画。^③家本来就是一个私密处所，陈设着收藏品的书斋或房间更是需要引领方能进入的特定空间。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高剑父，清末时因拜行商之后人伍德彝为师，得以欣赏伍家珍藏的古书画。^④贵重的私人收藏品摆放的位置通常比较固定，不轻易挪动，得见其庐山真面目的人不多。为研究碑文和铭文，金石学家会以拓本的形式将之复制，送给更多学者。清同治年间陈介祺将毛公鼎铭文拓本公之于众，与其他金石学家共同研究铭文上的内容和字体。^⑤由此足见，明清时期中国私人收藏虽有一定程度的开放，但它是私人空间内有限度的展示，与19世纪西方传入中国的对公众开放的展示理念完全不同。因此，本书描述的从私藏到公共展览的过程实际上交织着两条线索：一是在空间上从私人到公共的转变；二是在受众方面从互相认识的私人社交圈到公众的转变。

清末以降中国旧藏大量流失，深刻影响着国际和国内的文化发展。从早期贩运至欧洲的瓷器到八国联军搜刮的圆明园皇家珍宝，欧洲人将它们归为艺术品，放置于个人珍宝馆，如法国皇宫中的中国博物馆。^⑥辛亥革命前后，欧美国家和日本等通过各种途径购得清宫珍玩、敦煌遗宝、名家书画、宋元善本，形成大规模的中国收藏。“一直遭受外来势力摧残的中

① 《毛公鼎流传民间95年》，陈重远：《古玩谈旧闻》，北京出版社，2006，第11页。

② 〔美〕亨特：《旧中国杂记》，沈正邦译、章文钦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第58页。

③ 〔法〕伊凡：《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张小贵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139～144页。

④ 李健儿：《广东现代画人传》，香港，俭庐文艺苑，1941，第9页。

⑤ 《毛公鼎流传民间95年》，陈重远：《古玩谈旧闻》，第11页。

⑥ 〔法〕萨莫佑等：《枫丹白露城堡：欧仁妮皇后的中国博物馆》，王眉译，中西书局，2011；刘明倩：《从丝绸到瓷器——英国收藏家和博物馆的故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华，作为东亚文明的本源，其真正的价值在扩散传播的过程中，得到了国际上的正确理解。”^① 对于中国方面而言，这是一种缺失，当需要表现自我形象时唯有寻求其他新渠道作为补充，亦因之为新引入中国的生物、民俗、考古和美术等学科指导下收集的物品作为公共机构藏品和展示对象提供了契机。

2. 西方近代意义公共展览的兴起

近代意义的公共展览是 19 世纪以来西方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及城市居民公共活动的场所。^② 博物馆“museum”一词源自古希腊，是专门收藏艺术品、古代纪念物、稀有物品和矿物标本等机构的专用名词，如神庙。晚明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观察到：

（中）国之人珍爱古物；然而，却无雕像或纪念章，众多的青铜器则得到珍视，尤其是带有特殊侵蚀痕迹的。离开这些，它们就毫无价值。其他以陶土或碧玉（如翡翠）之称的古花瓶亦富有价值。但其中的佼佼者则是出自名家之手的珍贵画作，通常为水墨作品。或是有古代的作者写在纸上和绢上的文字，以印款来确证其为真迹。由于他们特好仿古，技巧娴熟，手法灵活，外行因此会耗费巨资，却购入不值一文的东西。^③

利玛窦指出中西收藏观迥然不同。此时的欧洲人认为值得收藏的古物包括钱币、纪念章和大理石雕像等。19 世纪前后，艺术属于人民的革命思想促使欧洲贵族藏品的物权越来越多被收归公有，^④ 不过此时博物馆仍延续着贵族鉴赏的传统，开放程度有限，如大英博物馆、罗浮宫等仅限艺

① [日] 富田生：《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赵秀敏译，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第 266～267 页。

② 有关欧洲公共领域的兴起，可参见 [德]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苑出版社，1999。

③ 转引自 [英] 柯律格《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高昕丹等译，三联书店，2015，第 88 页。

④ John Elsner and Roger Cardinal (eds.), *The Cultures of Collect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术家、学者和鉴赏家进入。^① 美国不受任何传统的束缚，19 世纪中期率先将博物馆作为社会公众教育的工具。^② 英国博物馆学家 Bennett 认为近代博物馆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1）利用公众关系建立和组织起来；（2）有内在组织；（3）有学术机构和团体的参与。^③

“exhibition”一词可以解释为展示艺术品、工厂产品和天然物品等的大型公开展览，典型代表要数 1851 年英国伦敦博览会。^④ 19 世纪以来博览会赋予了很强的目的性，集展览和销售于一体，具有促进工商业发展、传播新知与教育启蒙、文化形象再现三大功能。^⑤ 博览会展示的可以是书籍、珍玩和商品，甚至是各类物品的综合体。

近代以来博物馆和展览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不少博物馆的藏品源自展览会。1857 年成立的英国国立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其藏品有相当部分直接转自 1851 年的英国伦敦博览会，以及其他博览会，如有一张中国清代红木嵌螺钿炕桌，就是该博物馆于 1867 年购自巴黎博览会。^⑥ 类似从展览到收藏的现象在之后民国时期广州的博物馆和展览会也曾出现，这是本书要追踪的另一条重要线索。

3. 清末中国人对公共展览的认识

公共展览在欧美方兴未艾之际传入中国，当时仅少数中国人能真正亲身体验。

在国内，1840～1870 年出现一些洋人主持的展示活动。如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于同治十三年（1874）在上海创立一家博物院，内设有陈列室二间，乃上海博物院前身。该博物院是建立于动植物标本和化石收藏基础上的自然博物馆，中国历史文物则较少。博物院成立翌年

① [美] 卡尔文·汤姆金斯：《商人与收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创建记》，张建新译，译林出版社，2014，第 24 页。

② [美] 卡尔文·汤姆金斯：《商人与收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创建记》，第 24 页。

③ Tony Bennett, *The Birth of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06), p. 92.

④ J. A. Simpson and E. S. C. Weiner,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 537.

⑤ Paul Greenhalgh, *Ephemeral Vistas: the Expositions Universelles, Great Exhibitions, and World's Fairs, 1851-1939* (Lond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26.

⑥ 刘明倩：《从丝绸到瓷器——英国收藏家和博物馆的故事》，第 23、26 页。

《申报》报道了该院的概况。^① 据《北华捷报》1876年5月报道，博物院內拥有50余副哺乳类动物标本、3050只鸟类标本，以及大量蛇类、昆虫、贝壳和植物标本。^② 博物院专门聘请地理、动植物、考古等学科专家参与工作，甚至前往长江流域和华北各地采集标本。^③ 该博物院免费对公众开放，使得中国人有机会不出国门就能见识这种西方舶来的活动。1909年，《图画日报》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该院，配图为一名中国人戴着眼镜认真参观。^④

在国外，清政府应邀派出人员参加世界博览会，但在一开始这并没有引起中国人包括政府的注意。1870年代清政府把参加博览会的事务交给被洋人控制的中国海关负责，最有兴致参与的是那些看中了博览会商机的商人们。

清末，接触西方公共展览活动较多的要数广东人。由于历史传统、政府政策、地缘关系等种种因素，他们有较多机会走出国门：咸丰元年（1851），在第一次有记录的中国人参加的世界博览会上，广东商人徐荣村（1822~1873）便凭着“荣记湖丝”获得英国伦敦博览会金、银两项大奖；^⑤ 光绪二年，以广东人居多的中国首批留美幼童参观美国费城博览会；^⑥ 光绪十三年至十六年（1887~1890），广东学者潘飞声（1853~1934）应聘赴德国柏林大学东方文学院讲授汉文学，趁机游历欧洲数国的博物院、古画院；^⑦ 光绪三十年（1904），梁启超游学美国，得见圣路易斯博览会正大兴土木。^⑧

香港毗邻广东，是当时广东人见识西方公共展示活动的重要地区。香

① 《创设博物院》，《申报》1875年11月4日。

② “The Shanghai Museum,” Public Meeting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May 6, 1876, Vol. XVI, New Series, p. 436, 转引自吴方正《上海格致书院》，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1期，2006年，第27页。

③ 有关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研究，详见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吴方正：《上海格致书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1期，2006年，第1~52页。

④ 《上海之建筑：博物院》，《图画日报》第65号，1909年，第2页。

⑤ 徐荣村生平和博览会获奖证书，可参见《北岭徐氏宗谱》卷7，出版地不详，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第72~75页。

⑥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38页。

⑦ 参见潘飞声《说剑堂集》，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

⑧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107页。

港博物院于同治八年（1869）落成，是英国商人集资兴建、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展示机构，院内藏品芜杂，事实上仅具博物馆的雏形，^① 据报称，“系仿效东洋之举”。^② 日本是亚洲较早建立博物馆的国家，其首家国立博物馆设立于1872年，^③ 比香港晚三年。故不清楚上述报纸所说的“仿效”是指日本博物院内物品的陈列方式，抑或是日本举办博物展览会的形式。香港博物院内陈设的物品多是古玩、花草、翡翠、象牙等奇珍异宝，与上海的英国皇家亚洲文会的博物馆主要陈列标本化石不同。报道称，“粤中有家藏珍异”者将私藏的珍品拿到香港进行展示，希冀藏品被有识之士赏识，得以升值。^④ 由此可见，1870年代广东人即意识到可借公共展示提高藏品价值。首位到访香港的清廷督抚——两广总督刘坤一，光绪六年（1880）由港督亲自引领，前往博物院游历赏玩。刘氏对香港博物院留下深刻印象，大加赞赏。^⑤

国门之外的展览活动给广东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潘飞声写下《西海纪行卷》《柏林游记》《柏林竹枝词》等游记、诗文以纪之。^⑥ 梁启超在兴筑现场看到中国人被歧视，不禁发出感叹：“呜呼！各省摊派搜刮数十金，以贾唾骂，是亦不可以已耶！”^⑦ 表达了他对中国参加公共展览活动的看法。

此外，广东人对国内公共展示事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面对香港多姿多彩的公共展示，广东民众、私人藏家和政府官员似乎更多地仍停留于观赏和思考阶段，相较而言，广东商人则显得十分积极，他们迅速做出反应，表示要主动筹办。光绪元年（1875），广东省城的商人把活动提上议事日程，提议要举办赛花会，仿效1872~1875年英国人在香港举办过的三次小型展览会。此事后来似乎不了了之，但类似举措是时几未见于国内的华人圈子，仅上海租界内的洋人有相近的活动。^⑧ 1890年代宣传“商战

① 丁新豹：《格物致知：香港公共博物馆的百年发展》，《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4期。

② 《香港博物院被火》，《申报》1872年8月31日。

③ 参见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官方网页，<http://www.tnm.go.jp/en/history/12.html>。

④ 《香港博物院被火》，《申报》1872年8月31日。

⑤ 《广督到港》，《申报》1880年2月5日。

⑥ 参见潘飞声《说剑堂集》。

⑦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107页。

⑧ 《粤垣议行赛花会》，《申报》1875年1月27日。

救国”的两位广东人——郑观应（1842～1922）和康有为（1858～1927），皆提出通过公共展示振兴工商事业、普及教育的观点。^① 光绪三十年，留美幼童黄开甲（1859～1905）被清政府起用，负责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中国馆的事务，相信应同他28年前曾参观美国费城博览会有一定关系。

正因为中国公共展示的发展过程自始至终都与广东人有着密切关联，所以要探讨清末以来西方公共展示事业的传入和中国人私藏观念的转变，以广东人及广东省会所在地广州作为研究对象是极佳之选。

二 学术回顾

公共展示属于跨学科领域的课题，目前以博览会为研究对象出版成专书的研究成果达上千种。^② 1970年代法国史学家福柯关于展示与权力的开创性成果是公共展示研究中不可回避的理论方法。福柯针对监狱、麻风病院的空间安排和排列方式提出“全景敞视主义”的概念。所谓“全景敞视主义”，即把展示的空间和陈设的物品作为研究对象，从而揭示出展示者的权力操作。^③

此后学者纷纷将“全景敞视主义”理论运用于公共展示，并不断深化。1990年代博物馆学家Bennett在福柯理论脉络下，提出更为广泛而复杂的“展示丛结”理论。“丛结”就是将研究的视野从展示与权力两者的关系扩展到第三方，或者更多与之相关的方面。如从展场内各学科的陈列展示来解读展品、知识和展示者权力操纵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由展场内空间转移到展场外的百货公司、游乐园。^④ Timothy Mitchell所讨论的博览会会场内陈列物品的橱窗、地理模型、统计图表，则是“全景敞视主义”

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730～732页；张涛光编《康南海经济科技文选》，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第13页。

② 关于近年博览会的研究，可参考以下两个网站：<http://www.sil.si.edu/silpublications/world-fairs-2000.htm>；<http://www.lib.csufresno.edu/subjectresources/specialcollections/worldfairs/secondarybiblio.pdf>。前者主要选录了1992～1999年博览会研究书目，后者则收录了2002年以前出版的相关书目，共1200条以上。

③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等译，三联书店，1999，第219～256页。

④ Tony B. Bennett,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pp. 1-13, 59-88.

物质化的表征。^① Penelope Harvey 在《混杂的现代性：人类学、民族国家和万国博览会》一书中指出，展场中地理模型、人口统计数据、国旗、国歌，以及代表国家最高文化的各种文物、产品、民俗、服饰、宗教、节庆、历史渊源与发展等，都是展示“国家权力”不可或缺的符号元素。^② Patricia A. Morton 则把视野延伸到博览会的会场，试图通过建筑勾勒出博览会主办者的秩序蓝图。^③

在展示物品出现的过程中，学术、政治等各种影响因素都不能忽视。终身致力于艺术展览方面研究的 Francis Haskell 教授在其遗著 *The Ephemeral Museum: Old Master Paintings and the Rise of Art Exhibition* 一书中，在过往单个展览会研究的基础上，从报刊、日记中不同人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各时代展览的图像内画作陈列位置的分析，综合描绘了欧洲美术展览和博物馆出现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与各种学术团体千丝万缕的关系。^④ 公共展览中很多分散的东西被有意识地摆放在一起并加上标签成为组合，与刻意安排好的展览路线共同塑造出特定的形象，这些是私人收藏所不具备的。

利用展览有意识地塑造某种标签或形象的极佳例子要数殖民地展示。从西方展览会、博物馆出发的殖民地展示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被展者如何被帝国展示所影响并产生自我认识。Timothy Mitchell 在对列强展示埃及文物的研究中，指出博览会具有更为复杂的帝国与其殖民地互动的关系，“展示所创造的虚拟世界竟得以改变实体世界的样貌，这才是展示所具有的惊人权力”。作者观察到博览会将现实世界分拆为各种细小的单元，然后再加以整组重现，或按主题、国家、地方等分类，或以橱窗、模型、照片、图表、标本等方式分类。^⑤

知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经典著作《想象的共

① Timothy Mitchell, *Colonising Egyp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② Penelope Harvey, *Hybrids of Modernity: Anthropology, the Nation State and the Universal Exhibi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6) .

③ Patricia A. Morton: *Hybrid Modernities: Architecture and Representation at the 1931 Colonial Exposition, Paris* (Ma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2000) .

④ Francis Haskell, *The Ephemeral Museum: Old Master Paintings and the Rise of Art Exhibitio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⑤ Timothy Mitchell, *Colonising Egypt*.

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在探讨“民族主义”时指出“博物馆和博物馆化的想象都具有深刻的政治性”，也就是说，博物馆展示的物品表达的是主观意识，其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政府手中的工具，同时也成为殖民地人民以后对自我的认识。就如现今柬埔寨人视为本民族、国家象征之一的吴哥窟，其形象事实上是殖民统治时代的产物。在吴哥窟考古发掘、清理出来后，殖民统治者在自己的意识框架上赋予古遗址新的内容和形象。殖民地统治者利用博物馆和相片等手段不断强化他们制造出来的“吴哥形象”，成为日后柬埔寨人视吴哥窟为自己国家历史、民族认识的基础。^①

台湾的公共展示研究可说是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台湾公共展览兴起于日据时期，目前的研究也主要是围绕着该时期展开。日本学者松田京子的《帝国的视线——博览会与异文化的展现》一书，以1903年大阪第五回内国劝业博览会台湾馆作为研究对象，透过台湾馆展示的物品探讨19世纪末日本如何模仿西方建构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即把殖民地表述成“他者”次等的殖民论述，从中凸显日本帝国“我者”优越的地位。^②程佳惠《台湾史上第一大博览会——1935年魅力台湾 show》的基调与松田京子一致，亦透过博览会庆祝活动阐述日本殖民者如何建构帝国主义。^③另外郑健华《台湾日治时期博览会活动设计及其视觉传达表现之研究》、苏文清《始政四十年台湾博览会宣传计划与设计之研究》、刘融《日治时期台湾参展岛外博览会之研究》、林文通《日治时期始政三十年纪念展览会之研究》等硕士论文，试图从各层面勾勒出博览会展示中的台湾历史。^④上述研究的集大成者要数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吕绍理的力作《展示台湾：权力、空间与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该书描述了1895~1945年日据时期，台湾以日本殖民地的身份参加

①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187~209页。

② [日] 松田京子：《帝国的视线——博览会与异文化的展现》，东京，吉川弘文馆，2003。

③ 程佳惠：《台湾史上第一大博览会：1935年魅力台湾 show》，台南，远流出版社，2004。

④ 郑健华：《台湾日治时期博览会活动设计及其视觉传达表现之研究》，台湾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8；苏文清：《始政四十年台湾博会宣传计划与设计之研究》，台湾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8；刘融：《日治时期台湾参展岛外博览会之研究》，台湾暨南国际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林文通：《日治时期始政三十年纪念展览会之研究》，台湾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的国际展览和日本国内展览的展示活动，以及台湾岛内日本主导的展示活动，并考察了这三个层面的活动与台湾实体社会内游戏、娱乐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出展示活动中的表述决定了日后历史记忆中的台湾形象的结论。该书作者希望利用展示对帝国和殖民地关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摆脱以往台湾史研究中殖民与反殖民的二元思维。^①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另辟蹊径，开始将展示研究的目光投向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跳离以往局限于帝国和殖民地的关系，其中尤为受到研究者关注的是清末各种呈现中国形象的公共展览活动。

Lisa Claypool 运用不同的角度和材料，如档案、日记、报刊，甚至设计图纸，来描述和分析光绪三十一年（1905）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内部建筑和文物陈列（包括原先的设计和后来的发展），并与同时期附近的上海教会博物馆进行比较，借以了解张謇办博物馆的意图及中国接受博物馆这一外来事物的过程。Lisa Claypool 指出，当时中国出现的“博物馆”概念在内涵上跟西方同时期的“博物馆”是不同的：以张謇为代表的士绅可能视博物馆为传统文人“雅集”的新形式，不像同时期西方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与学术研究机构有密切关系。^②

台湾学者王正华《呈现“中国”：晚清参与1904年美国圣路易万国博览会之研究》一文，某种程度上纠正过往国人的看法。20世纪初以来，民族主义影响下的中国人认为清末政府将参与世界博览会的事务交给外国人打理，因此整个展览中，中国形象完全处于一种任人摆布的被动状态。^③可是，王正华通过圣路易斯博览会上中国馆与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

① 吕绍理：《展示台湾：权力、空间与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麦田出版社，2005。

② Lisa Claypool, "Zhang Jian and China's First Museu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4, No. 3 (2005): 567-604.

③ 相关的言论，可参见《论各省派员赛会办法未合》，张元济编《外交报汇编》第1册，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第269~272页；《论伦贝子赛会之结果》，张元济编《外交报汇编》第1册，第507~510页；《书美洲学报实业界记散鲁伊斯博览会中国人赛情形后》，张元济编《外交报汇编》第1册，第601~612页；《华物赴赛》，张元济编《外交报汇编》第21册，第46页；《详述华商河内赛会情形》，张元济编《外交报汇编》第21册，第65~66页；《赛会汇纪》，张元济编《外交报汇编》第21册，第91~92页；《赛会近事》，张元济编《外交报汇编》第21册，第100~101页。近年持该种观点的论文，可参见沈惠芬《晚清海关与国际博览会》，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马敏：《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乔兆红：《百年演绎：中国博览会事业的嬗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